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

——以陕甘宁 3 省的 30 个村 339 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夏显力, 张 华, 郝晶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 30 个村的 339 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对他们的职业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归纳, 并用 Logistic 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以期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现状提供参考。研究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 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 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 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职业转移; 影响因素; Logistic 模型;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F 3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1)06-0060-06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 后”、“90 后”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一群青年农村人。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 新生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供的最新人口信息表明,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我国内地进入人口流动迁移活跃高峰时期: 2008 年全国流动人口为 2.01 亿, 2009 年为 2.11 亿, 其中“80 后”成为流动人口主体, 占到总量的 60% 以上^[1]。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高, 人生目标更加多元化, 心理压力和困惑加重, 农业生产经验缺乏, 消费观念更加开放, 维权意识不断增强, 他们比第一代农民工更能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并且对自身职业要求更高^[2]。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具备社会融合的客观条件, 他们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均优于第一代农民工, 但是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实际社会融合程度仍不容乐观。王春光^[3]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成为城市人, 但制度上的壁垒使得他们融入城市的过程相对艰辛; 许传新^[4]、魏晨^[5]、方小教^[6]等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认同或者对城市的归属感总体上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强烈, 但仍具不确定性, 更具游移的特征; 其乡土认同在减弱, 对未来归属的选择方面更可能是“候鸟式”的生活方式; 张大为等^[7]从城乡二元体制、

住房、自身受教育水平、权益保障等方面对后危机时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就业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对策建议。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是实现其市民化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 因此, 弄清他们就业的真实境遇和职业转移状况, 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合理引导他们进行职业转移, 对加速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1. 样本选择

西北地区是我国农民工输出的主要集中地, 为了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的状况及困境, 调查区域选择了陕西省、甘肃省和宁夏 3 个劳务输出大省的 30 个村。村庄选点和样本抽取严格遵循抽样调查方法的基本要求, 保证了随机抽样后样本的覆盖面和代表性。2010 年 1—3 月, 调查小组在三省共调查样本 415 个, 剔除不合格样本后, 得到有效样本 339 份, 其中陕西省 213 份、甘肃 93 份、宁夏 33 份。

2. 描述性统计

(1) 受访新生代农民工区域性特征。此次调研涉及的新生代农民工, 位于城市郊区的有 51 人, 占

收稿日期: 2010-08-09

*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小城镇群网化形成机理、模式与路径研究”(10XJCZH01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青年学术骨干项目“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内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Z111020712)。

作者简介: 夏显力(1973-), 男,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土地资源管理、城镇化。E-mail: xnxqli@163.com

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的 15.04%;位于普通农村的人数为 288 人,占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的 84.96%。居住地经济条件在当地属于上等的人数为 3 人,占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的 0.89%;居住地经济条件在当地属于中上等的人数为 49 人,占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的 14.45%;居住地经济条件在当地属于中等的人数为 146 人,占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的 43.07%;居住地经济条件在当地属于中下等的人数为 86 人,占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的 25.37%;居住地经济条件在当地属于下等的人数为 55 人,占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的 16.22%。

(2) 受访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基本特征。统计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以男性为主,已婚者占多数。外出务工经历在 5 年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样本总量的 66.36%,具体如表 1。

表 1 受访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基本特征

	基本特征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239	70.50
	女	100	29.50
婚姻状况	已婚	196	57.82
	未婚	143	42.18
工龄	不固定,间歇性的	1	0.30
	1 年以下	9	2.66
	1~3 年	48	14.16
	3~5 年	56	16.52
	5~7 年	63	18.58
	7~10 年	79	23.30
	10 年以上	83	24.48

(3) 受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状况。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单位按性质分为以下 4 种: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政府部门及其他事业单位。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大都是雇佣模式,很难享受单位的福利。资料统计显示,私营企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为 186 人,占样本总人数的 54.87%,超过一半。这些企业绝大多数对员工各方面技能要求不高,工资也相对较低。三资企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为 93 人,占样本总人数的 27.43%。三资企业对员工的要求较高,大部分都要求员工参加一定的培训。在该单位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具有特殊技能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特点。政府部门及其他事业单位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为 49 人,占样本总人数的 14.45%。国有企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为 11 人,占样本总人数的 3.24%。从调查情况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基本属于非正规就业,就业很不稳定,即使是在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及其他事业单位中

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是如此。

二、受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情况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主要包括区域转移、行业转移、工种转移和兼营农业等形式。调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区域转移和行业转移的趋势比较明显,区域转移的含义是新生代农民工跨区域进行再就业。行业转移是指新生代农民工跨行业进行再就业。

1.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频率

由于就业的不稳定以及就业环境、就业待遇较差,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包含区域转移和行业转移等)是相当频繁的。调查资料统计显示,88.2%的新生代农民工都有职业转移的经历,其中有 56 人转移过 4 次及 4 次以上,占样本总人数的 16.52%;69 人转移过 3 次,占样本总人数的 20.35%;67 人转移过 2 次,占样本总人数的 19.77%;107 人转移过 1 次,占样本总人数的 31.56%。没有进行职业转移的新生代农民工仅为 40 人,占样本总人数的 11.8%,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人。

2. 新生代农民工区域转移方向

根据调查资料统计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未进行区域转移的人数为 202 人,占样本总数的 59.59%;进行区域转移的人数为 137 人,占样本总数的 40.41%。转移的方向以其家所在村庄为参考,主要有以下 5 种情形:由近至远;由远至近;由远至近再至远;由近至远再至近及其他情形的转移。如表 2 所示,在 5 种区域转移的类型中由远至近的人数最多,人数为 48 人,占区域转移人数的比例最高,为 35.04%。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区域转移方向

转移方向	由近至远	由远至近	由远至近再至远	由近至远再至近	其他情形的转移
人数	30	48	23	21	15
比例/%	21.90	35.04	16.79	15.33	10.94

3. 新生代农民工行业转移行为

本文参考朱明芬^[8]的观点,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业分为服务业、工业、建筑业、个体工商业和技术服务业。如表 3 所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相对稳定,有 89 名被调查者没有发生行业转移,占样本总数的 26.25%,其中 42.70%的人集中于服务业,28.09%的人集中于建筑业,22.47%的人集中于

工业。在进行行业转移的 250 名被调查者中,有 54% 的被调查者在同种行业间进行转移,46% 的被调查者进行跨行业转移。

表 3 发生行业转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情况

行业转移类型	转移人数	比例/%
同行业间转移	135	54.00
服务业转工业	30	12.00
工业转服务业	25	10.00
工业转建筑业	19	7.60
服务业转建筑业	15	6.00
建筑转工业	9	3.60
服务业转个体工商业	6	2.40
工业转个体工商业	5	2.00
建筑业转个体工商业	4	1.60
个体工商业转服务业	2	0.80

三、研究假设、变量选择、计量模型及结果分析

1. 研究假设与变量选择

通过对文献的收集整理,我们发现大量研究者主要是对一般劳动力的职业流动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李若建^[9]研究了性别、年龄、文化对职业流动的影响。陆德梅^[10]研究指出由于受教育程度、培训、资历等是企业甄选人员的主要指标,因此这些因素对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有着直接的影响。刘精明^[11]对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本存量(年龄、工作经历、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对农民职业转换作用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年龄、教育对职业转换有重要意义。孙琼如^[12]调查发现外来农村妇女的职业流动受到个人特征及家庭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个人特征因素包括年龄、进城务工时间、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

家庭特征因素包括婚姻状况及已婚妇女的配偶收入,并提出制度因素和政府政策的重要性。张瑞玲^[13]从社会流动角度提出影响代际职业流动的因素有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个人因素包含性别、就业时年龄、文化程度、就业前是否参加过培训、就业时间等 5 个变量。家庭因素包含家庭文化资源(父母亲文化程度)、家庭政治资源(父母是否为党员)、家庭经济资源(家庭经济水平在本村所处的位置)等变量。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很特殊的阶段性现象,他们与一般劳动力(主要是指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既有差异性又有相似性。年轻、有闯劲、文化程度较高、缺乏农业农村生活经历、志向更大、对城市生活渴望的内在特质,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转移并不仅仅是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以及享受更好的城市化生活。在城乡二元体制羁绊仍未消除的情况下,家庭特征、就业地发展环境仍然会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产生影响。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1)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变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培训、工龄对他们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2)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特征变量,如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婚姻状况、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对他们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3)就业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出台的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具体政策对他们职业转移也有显著影响。

根据研究假设和调查结果,本文引入 3 类共 11 个解释变量。具体的变量名及其含义见表 4,各变量实际调查值范围及其特征值见表 5。

表 4 变量名称及其解释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及赋值	预期影响方向
性别	女性=0;男性=1	+/-
年龄	16~19=1; 20~23=2; 24~27=3; 28~30=4	+/-
受教育程度	文盲=1;小学文化=2;初中文化=3;高中文化=4;高中以上=5	+
婚姻状况	未婚=0;已婚=1	-
工龄	不固定=1;1年以下=2;1~3年=3; 3~5年=4;5~7年=5;7~10年=6;10年以上=7	+
是否接受过培训	没有=0;有=1	+
家庭经济水平	下等=1;中下=2;中等=3;中上=4;上等=5	+/-
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20%=1;20%~50%=2;50%~80%=3;80%以上=4	+/-
配偶月收入	无配偶或者配偶无收入=1;500元以下=2;500~1000元=3; 1000~1500元=4;1500~2000元=5;2000~3000元=6;3000元以上=7	+
城市规模	小城镇及农村=1;小城市=2;中等城市=3;大城市=4	+
区域性政策	没有=0;有=1	+

表 5 变量名称及其调查数据统计分析

变量名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进行职业转移	0	1	0.88	0.323
解释变量				
性别	0	1	0.71	0.455
年龄	1	4	2.87	0.794
受教育程度	1	5	3.37	1.033
婚姻状况	0	1	0.58	0.495
工龄	1	7	5.18	1.484
培训	0	1	0.09	0.293
配偶月收入	1	6	2.04	1.332
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1	4	2.97	0.822
家庭经济水平	1	5	3.09	0.954
城市规模	1	4	3.14	0.962
区域性政策	0	1	0.84	0.366

2. 计量模型

根据问卷调查,本研究把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进行职业转移定义为二分决策(职业转移=1,不转移=0),用 Logistic 模型来描述这个决策。

表 6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的因素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B	S.E	Wald 检验值	Sig.	Exp(B)
培训	13.025	5.924E3	0.000	0.998	4.537E5
婚姻状况***	-6.556	2.481	6.986	0.008	0.001
性别***	6.487	2.383	7.411	0.006	656.369
城市规模***	5.009	1.824	7.541	0.006	149.689
配偶月收入**	1.934	0.828	5.453	0.020	6.914
区域性政策	1.708	1.403	1.481	0.224	5.516
工龄**	1.707	0.839	4.144	0.042	5.512
家庭经济水平	1.129	0.831	1.844	0.174	3.092
受教育程度	1.080	0.869	1.545	0.214	2.945
年龄	-0.248	0.875	0.080	0.777	0.780
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	-0.090	0.979	0.008	0.927	0.914
常数项	-27.774	9.600	8.369	0.004	0.000

模型拟合优度指标: $\chi^2=26.667, Sig.=0.923$

注: * 和 ** 和 *** 分别表示在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其中, B 为回归系数、S.E 为标准误差、Sig. 表示不同变量 Wald 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Exp(B) 为发生比率。

(1) 是否接受培训。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接受培训因子的影响系数为 13.025, 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接受培训对其职业转移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掌握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 其职业转移相对容易。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 参加过培训, 尤其是参加过国家或地方针对企业急需人员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 相对容易找到工作, 而且更换工作的频率较高, 工资收入也随之增加。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进行职业转移的 Logistic 模型为:

$$P = F(\alpha + \sum_{i=1}^m \beta_j X_{ij}) = \frac{1}{1 + \exp(-\alpha + \sum_{i=1}^m \beta_j X_{ij})} + e_i$$

其中, P 表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转移的概率, 当 P=1 时表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转移, 当 P=0 时表示新生代农民工不进行职业转移。β_j 表示回归系数, m 表示影响这一概率的因素个数。X_{ij} 是自变量, 表示第 j 种影响因素, α 表示回归截距, e_i 表示随机扰动项。

3. 计量结果分析

运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对所调查的 339 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的相关数据进行了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6。经检验, 各变量之间无高度相关性,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 6 统计检验结果表明, 本回归模型拟合度良好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回归结果可信。

(2) 婚姻状况。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因子的影响系数为 -6.556, 且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这说明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的倾向比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高, 这主要是因为未婚新生代农民工负担小, 受家庭羁绊小。

(3) 性别。性别因子的影响系数为 6.487, 且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说明男性在职业转移的过程中比女性有优势, 更容易进行职业转移。

(4)城市规模。城市规模因子的影响系数为 5.009,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城市规模越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越具有吸引力,新生代农民工在大城市职业转移频率高。

(5)配偶月收入。配偶月收入因子的影响系数为 1.934,且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配偶收入水平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越频繁。这主要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转移是有风险的,所以当配偶的收入水平越高,配偶帮助其分担职业转移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新生代农民工就越敢于进行职业转移。

(6)区域性政策。区域性政策因子的影响系数为 1.708,这说明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当区域出台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区域的相关政策时,新生代农民工就有向该区域进行职业转移的倾向。

(7)工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因子的影响系数为 1.707,且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原因可能是进城务工时间越长,其对城市越了解,工作经验越丰富,社会关系网络越广,其进行职业转移也就相对容易,向上流动的机率也更大。

(8)家庭经济水平。家庭经济水平因子的影响系数为 1.129,说明家庭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原因可能是家庭经济水平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上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投入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14],因而他们更加易于发生职业转移。

(9)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因子的影响系数为 1.080,这说明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进行职业转移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不同,在寻找工作时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正规学校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其职业转移的频率和机会也比较高。

(10)年龄。年龄因子的影响系数为-0.248,这说明年龄越小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愿意进行职业转移,但是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加,职业转移的频率也略有降低。

(11)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因子的影响系数为-0.090,这说明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越低,越愿意进行职业转移,但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

收入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的影响。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后做出的抉择,为了防止他们在职业流动中沦落为游民或者成为问题民工,为此建议:①通过创造平等公开、公平对待的就业环境,引导和支持新生代农民工合理流动,不要刻意阻断新生代农民工向大城市及其周边流动的路径。②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创业技能的培训,优化他们的知识结构,提升农民工自身的职业素质,增强他们在就业地的适应能力。③提高工资福利待遇,改变生存困境,减少新生代农民工不合理的频繁流动。④消除制度性障碍,在户籍、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子女教育、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公民权。⑤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从个人市民化到家庭市民化过程依然漫长,但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仍需要未雨绸缪,及早应对。

参 考 文 献

- [1] 张国亮. 2008 年全国流动人口过 2 亿计生工作更迫切[EB/OL]. (2009-4-14) [2010-02-12]. http://www.cnr.cn/news-center/gnxw/200904/t20090414_505302419.html.
- [2] 李新家. 广州消费蓝皮书[M]. 广州: 经济出版社, 2008: 23.
- [3]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01(3): 63-76.
- [4] 许传新.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J]. 学术探索, 2007(3): 58-62.
- [5] 魏晨.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以徐州地区为例[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6(12): 106-109.
- [6] 方小教. 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辨析[J].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10(1): 51-55.
- [7] 张大为, 赵震, 刘帅. 后危机时代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就业问题研究[J]. 农业经济, 2011(5): 89-90.
- [8] 朱明芬. 农民工职业转移特征与影响因素探讨[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6): 9-20.
- [9] 李若建. 当代中国职业流动研究[J]. 人口研究, 1995(6): 77-79.
- [10] 陆德梅. 职业流动的途径及其相关因素对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J]. 社会, 2005(3): 101-115.

- [11] 刘精明. 向非农职业流动: 农民生活史的一项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1(6): 1-18.
- [12] 孙琼如. 外来农村妇女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7(4): 16-34.
- [13] 张瑞玲. 农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研究[J]. 兰州学刊, 2009(3): 111-114.
- [14] 李春玲. 中国城镇社会流动[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131.

Factors Influencing Occupation Transition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 in Northwest China

—Based on a Survey of 339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 in 30 Villages in Shaanxi, Gansu and Ningxia Provinces

XIA Xian-li, ZHANG Hua, HAO Jing-hu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 Based on a survey of 339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30 villages from Shaanxi, Gansu and Ningxia in northwest China, this paper uses statistic inductive and SPSS16.0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occupation transi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se migrant workers with the purpose of giving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occupation status quo. The result shows that occupation transition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s decided under particular environment. Training experiences, marriage status, gender and city scale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occupation transition, and working years, educational level, spouse income, family total income and regional policy also play a significant factor. While age and proportion of non-farming income in the family total income don't have obvious effect on occupation transition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 occupation transition; influencing factor; Logistic model; policy suggestion

(责任编辑: 陈万红)